



中国 文化语言学 辞典



宋永培 端木黎明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WENHUA
YUYANXUE
CIDIAN

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



宋永培 端木黎明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黄成军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

宋永培 端木黎明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邮电印制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5 字数 50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100-3/H·144

印数：01—2000 册

定 价：19.80 元

序

戴昭铭

友

人宋永培君与端木黎明女士编成了一部《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文化语言学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兴起的联系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语言的语言学新流派。在短短几年中，它已初步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的新学科，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样迅疾的效应在语言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这部辞典的编成和出版，既是这门新学科草创鸿图阶段的工作总结，也是学科建设初获成功的一个标志。笔者在这一新领域创获不多，本无写序的资格，但感于编纂者邀约的真诚，于是勉力为之，借此机会对这一学科的由来和现状作一概括的介绍，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谈谈看法。

一 文化语言学的由来

文化语言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凭空的，而是有一定的内在依据、外部条件和学术渊源的。

1、内在依据。从人类语言的根本属性说，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形式和建构手段之一。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语言并不是独立于人类

社会之外的抽象的结构系统,也不是发自本能的机械的“刺激和反应”或得自遗传的“天赋”机制,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性和本身的一部分。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是“符号的动物”,而在人为自己所创造的符号世界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就是语言。语言不仅介入和渗透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部门几乎都必须借助语言才得以建构和传承。语言又是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因此,语言中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印迹,语言的结构和词语中体现着民族的文化思维、文化心理、文化历史和价值观念。人们把语言的这种文化特性叫做“语言的人文性”。语言的人文性使从文化角度研究语言或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化成为可能。

2、外部条件。80年代中后期,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类理解的增进,东西方冷战状态的结束,一个建设多元一体化的多边合作与多边竞争的人类社会新时代开始出现。在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一门综合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生活状态和思维行为方式的“文化科学”成了热门学科。人们普遍感受和认识到了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建设人类社会新文化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学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引发了学术界的“文化热”、“反思热”。在比较宽松民主的学术氛围下,受学术界“文化热”的推动,中国语言学界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进行反思,内心产生了遭受社会冷遇的“失落感”。追本溯源,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现代语言学受西方语言学影响过深,把语言单纯看作工具或形式系统,专注于结构描写和形式化的研究,忽略了语言属性的人文性一面,致使汉语研究脱离了其它人文科学而成了孤

家寡人。为此他们特别强调语言尤其是汉语的人文性,认为只有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注重研究语言的文化属性或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才能补救以往的偏弊,提高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为文化建设多作贡献。此外,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文化分析的实际需要,也是建立文化语言学的一个推动性因素。

3、学术渊源。就总体看,文化语言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有西学、中学两个方面。

西学渊源。研究者们理论灵感主要获自:(1)当代某些西方哲学家的某些理论或论断,如卡西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加达默尔的释义学思想、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和存在的关系的论断等;(2)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学原理;(3)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某些思想,如关于语言 and 世界观、和民族精神的关系以及汉语特点等方面的见解;(4)美洲人类语言学家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等关于语言和文化、和思维、和世界观的关系的思想;(5)欧美和苏联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等等。当然,不同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对上述这些理论还有不同的取舍,但共同的一点则是:大家都借用所引述的思想和论断来强调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强调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学渊源。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学“小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尽管有沦为经学附庸的缺陷,但由于注重实用,同中国文化的血肉交融,所以曾获得比较发达的规模和丰富的成果,为各门人文学科所重视,至今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语言学应当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良传统,用以克服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上模仿外国、研究上脱离中国语言 and 文化的实际、不大注重实用的偏向。因此,文化语言学比较注重搜集和发掘与文化问题有关的

语言现象或与语言问题有关的文化现象，运用比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进行现象之成因方面的解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小学”中的文化阐释传统吸收当代文化人类学、人类语言学、释义学和民族学中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后在新时代的再生。有的研究者（如下述的本体论学派）还比较注重吸收和发挥中国古代文论中“天人合一”、“文道一统”的思想和某些句法理论，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 文化语言学的现状

尽管文化语言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一些西方汉学家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研究，而且三、四十年代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些学者的语言研究也多少杂有文化学的成分，但是真正堪称文化语言学的先声而被公推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的，是罗常培在50年代初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表现在此书中有两点可贵的自觉：一是主动接受萨丕尔、帕默、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二是明确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为此作者要以自己的研究“给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给中国的语言学开一条“新路”。然而，尽管如作者所说，“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此后的30多年中这条路上却一直人迹罕至，作者寄予厚望的语言和文化的结合研究一直未能进行。这不能不说是—桩巨大的“历史的遗憾”。

80年代最先自觉走上语言和文化结合研究这条道路上

来的人，是方言学者游汝杰。游在 80 年代初发表的《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已初步显示出作者其后坚持的这一方向的潜能。稍后，作者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 1984—1986 年间联名发表了 5 篇文章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中刊于《复旦学报》1985 年第 3 期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此文以及同名专著以深厚的功力、广阔的视野、丰富翔实材料和严谨务实的态度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学术风范，颇受语言学界内外的好评，对文化语言学的建立和研究热潮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感召和推动作用。

受游、周二人的影响，一大批在 80 年代初期就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传统有所反思的中青年学者归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1987 年发表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文章约有百篇左右，在中国语言学界形成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语言学新潮。这股新潮与以 1979 年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发表为开端的社会语言学在 1987 年 12 月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汇合。从这年起，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出了声势和实力，也形成了流派的特点和分歧。尽管由于申小龙连篇累牍的理论鼓吹和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不无偏激的批判给文化语言学招致不少非议，但文化语言学的吸引力并未因此减弱。短短几年中，已有数百篇论文和 20 余本专著发表，其中不乏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到深入的专题研究。

下面分两个方面简述文化语言学的现状。

1、流派和理论建设

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的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论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

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语言现象在文化中、文化现象在语言中都互有表现，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这一派的研究模式是“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游汝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这一提法中包含了方法论原则。至于具体方法，各家所述略有不同。陈建民列出的有对比法、投影法、文化结构分析法、文化心理分析法；邢福义等列出的有实地参与考察法、共层背景比较法、整合外因分析法。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它“制约人类的思维和文化心理”，“语言是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语言决定文化”。语言的这种属性叫做“语言的人文性”，它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包括“语言统一文化各领域的功能”、“文化渗透语言各领域的功能”和“人文科学各领域特有语言的功能”三大方面。这一派特别强调汉语独特的人文性，认为汉语的这一特性使它特别不适合于西方语言分析的一套范畴和方法，从而把《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看作是模仿西方语言学、脱离汉语本体、背离传统文化形成的“文化断层”，文化语言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使中国语言学在本世纪内实现“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折”。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

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

上述两派是我们就双方的理论主张和研究风格而作的相对区分，实际上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点从双方在论著中往往有共同的引证和互相的引述可以见出。尽管关系论派不像本体论派那样注重同语言有关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本体论派也不像关系论派那样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缺陷持冷静温和的批评态度，但在不少具体问题上，双方的方法和结论仍十分相近。

2、具体问题的研究

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在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成效是衡量其理论主张的标尺，也是判定学科的潜能和活力的依据。文化语言学在几年中已经取得了用其他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取得的成绩。较为重要的方面是：

方言学。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打破了以往方言描写的旧框框，把方言同中国文化史的许多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获得了关于方言分化与中国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如认为现存方言分布的类型同历史上移民的方式有关：占据式移民造成了大面积一致性的方言、墨渍式移民造成了蛙跳型方言、蔓延式移民造成了渐变型方言、杂居式移民造成了掺杂型方言、闭锁式移民造成了孤岛型方言、板块转移式移民造成了相似型方言；又如汉语方言地理跟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特别是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关系很大，用“历史地理分析法”参照唐宋以来州府辖区划分次方言区，可以解决“同言线法”所难以决断的疑难。作者还利用众多的文献资料拟测出了中国古代的方言地理。关于方言与民

俗的关系,本书讨论得也很有特色。另一篇讨论山西方言词语与山西民俗的关系的文章是温端政的《方言与民俗》。李行健的一篇文章列举大量的天津方言词说明方言词语对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意义。

词汇学。语言中的词因其具有作为文化符号显著表征的特点,最容易引起关注,因而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较语言的其他部门多一些。宋永培在古汉语词义研究中颇出新意。他研究《说文》词义系统的结果是:其中表示“聚合”的义位大大多于表示“分解”的义位(369:133),而其词义系统又主要表现为对立义系构成或转化为统一。据此他探求了中国古代社会统一多于分裂的思想依据。这种从宏观角度作系统性研究的方法比那种仅据一些零散材料就作“心证”式结论的方法更好。宋在另一文中提出了建立中国文化词汇学的设想。周光庆、苏新春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在系统化方面与宋相近,且更以论断的稳妥平实见长。关于某些与文化关系密切的词语类别的研究较有成绩者有:(1)人名:吕叔湘写成于40年代、发表于1988年的《南北朝人名与佛教》是一篇力作,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堪为“样品”;王建华、郑宝倩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颇为人称道,王已有专著《文化的镜象——人名》出版。(2)外来词:以史有为的专著《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为代表。(3)颜色词:以刘云泉的研究为代表。(4)隐语:以曲彥斌的专著《中国民间秘密语》为代表。此外,关于禁忌语、敬语、谦词、称谓词、数词、地名、店名等的研究也有不少文章发表。语词与民俗的关系密切。曲彥斌《民俗语言学》一书古今兼载,收罗赅备,范围几乎遍涉与语词有关的所有民俗领域,且作了一程度的理论探讨。

语法学。申小龙在中国语言文化通观下,以其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学传统的彻底否定为指归而提出的汉语

句型新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界独树一帜。申氏从哲学和文化心理角度切入研究,认为在汉族人“整体思维、散点透视、综合知解”的致思特点观照下,汉语语法所体现的总规律是“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在摒弃西方语言的焦点视、主谓视、单域视等心理视点的同时,他揭示并强调了汉语心理视点的散点视、非主谓视和双域视;在指出西方语言受形态制约的“法”治特点的同时,他指出并论证了在汉语表达中表现在弹性实体、流块建构和神摄方法中的非常灵活的主体意识。在表达功能论的总原则下,他采用“层次——视点”切分法分析判定句子结构模式,对《左传》和中篇小说《井》进行穷尽式分类描写,得出了关于汉语句型系统的新认识。尽管在范畴、术语和句法结构的微观层次等方面,申氏的句法理论还有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尚需进一步周密化,但申氏的句法理论无疑能为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的建立提供有启迪意义的新思路。关于汉语语法的意合性和灵活性问题,早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并研究过,近几年中发表的徐静茜、萧国政和吴振国、沈锡伦、张黎等人的文章,则表现出把这两方面问题同汉族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的特点联系起来研究的努力。

言语交际。陈建民在1987年曾出版一本小册子《说话的艺术》,尽管其总体设计不是从文化角度研究言语交际,但其中已有不少篇幅分别从交际角度、身分、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讨论问题。他于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一书中有《称谓》一章,专门讨论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在言语交际中所体现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所受到的文化习俗制约。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基于当前社交称谓中有六种“缺环”现象的看法所提出的关于新型称谓建设的设想很有文化建设的价值,可以引出进一步的讨论。陈氏于1990年第1期《汉语学习》上又发一文讨论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外,李晋奎的

《人际关系与称呼语》和胡明扬的《问候语的文化心理背景》两文也都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交际用语的。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一书从词义、日常谈话、成语和典故、谚语和格言、比喻和联想、委婉语和禁忌语、敬语和谦语、文体、言语变体、身势语等各方面探讨了英语国家的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由于例证丰富，又处处从交际和对比两个角度讨论，此书读来饶有趣味。

另外，从文化角度研究汉字、汉语修辞以及民族语文等等方面的问题，也有不少成果发表。

三 文化语言学的前途

文化语言学诞生以来短短几年中，不仅已经取得上述成绩，而且显示了它较强的活力。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举行有众多学者参加的关于语言与文化问题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讨会，1992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语言与文化”为专门议题；国内不少大学开设了文化语言学专题课，关于文化语言学的丛书、文集、专书和教材在陆续出版。文化语言学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使有人作出过于乐观的预言，认为它将取代现有中国语言学，使中国语言学由描写型转为人文型；也有人认为文化语言学根基不足，是空中楼阁，怀疑它有作为一种语言学的学科资格。笔者认为，这两种断言都过犹不及，有失偏颇。

首先，文化语言学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作为以阐释语言的文化内涵为目标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交叉渗透型学科，文化语言学可以弥补现代语言学因专注于语言结构的静态描写所造成的缺陷，它有其他语言学科，包括性质相近的社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这种价值和作用也将进一步得到认识和承认。它将与中国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建立一种相比较而存在、以互补求完整的兄弟关系,从而获得繁荣发展。这是可以预计的。

其次,文化语言学将进一步完善和定型。不少研究者和评论者都已指出,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还比较粗疏,需要进一步精密化和完善化。比如申小龙提出的作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文化功能”三方面之一的“文化渗透语言各领域的功能”,按其表述方式简缩后应是“文化……的功能”,这样的表述不仅与其上位“语言的文化功能”相抵触,也与同位的其余两项在逻辑上难以并比。而且,文化语言学研究“文化……的功能”,岂非有成为文化学之嫌?尽管在这一标题下的一节文章并非讨论文化问题而仍是讨论语言问题,但至少这一表述法是欠推敲的。实际上,在关系论派的不少论著中,究竟是文化语言学还是语言文化学的问题是存在的。如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不仅从理论上提出“本书的文化语言学……等一般的文化语言学加上语言文化学”,而且从全书看也确实这二者的相加。游、周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也存在这一问题:文化语言学要想成为一个范围定型的语言学科,除了与相邻的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或人类语言学有大致的界限外,还应排除语言文化学的内容。它应成为“为语言而就文化研究的语言学”,不应成为“为文化而就语言研究的文化学”。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其三,关系论派和本体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关系论派只有吸收本体论派的长处,善于从汉语本体中提取出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强解释力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和解释汉语的结构规律,才能保持持久的理论活力,形成系统的学科规模,造成可观的学术

成就。不然，单纯在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对应现象，既难以避免琐屑短钉的毛病，积久还可能因找不出新东西而导致学科的萎缩。本体论派只有学习关系论派审慎严谨的态度和作风，不作大而无当过犹不及的理论批判，力戒粗疏武断令人费解的表述，不断使自己的理论精细化严密化，并在语言的微观层次方面的研究上多下些扎实的功夫，才能避免空疏玄谈之讥议，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承认。也许，两派汇成一体之日，就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建设完全成功之时。

在结束本文前，我觉得还有必要就本词典的编纂者和编纂特色说几句。宋永培是专攻《说文》与训诂学的，几年来他用语言与文化结合的方法研究《说文》词义系统，已获得不少为人称道的成果。他治学勤勉严谨，肯下扎实的功夫；持论公允平直，较少偏见和武断。我觉得由永培君来承担文化语言学这样一门目前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的新学科的词典的编纂工作，是很适宜的。从编写体例、条目设计和材料处理等方面看，这部辞典可以说是体大思精、广收博载而又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它的内容是专科性的，而条目设置和解释方式则是百科性的。它融资料性、工具性和学术性为一体，堪称文化语言学的小“百科全书”。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人可以用它作为索引工具，对文化语言学有兴趣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可以把它作为入门向导，语言学界以外的人也可以把它作为浏览文化语言学概貌的“广角镜”。我甚至还有个奢望，就是那些对文化语言学至今仍持偏见或成见的善意者，在看了这部辞典后，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从总体来看，文化语言学还不能说是怪胎、毒瘤或洪水猛兽，只是似乎稍欠成熟一些而已。这样想过之后，这些人也许就会心平气和多了。作为一部关于新学科的第一本辞典，能够有这样一些功用，也就庶几不负编纂者的苦

心了。

1992 年 10 月于黑龙江大学

凡 例

本辞典主要反映 1980 年至 1992 年 8 月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也适当反映 1900 年至 1980 年在中国语言与文化结合研究方面有价值的成果。

二、辞典正文按以下类别依次排列词条：

- 1、中国文化语言学综论
- 2、语言与文化
- 3、中国历代语言与文化结合研究
- 4、训诂、词义、词汇与文化
- 5、汉字与文化
- 6、方言与文化
- 7、专名与文化
- 8、语言接触、融合与文化
- 9、语法与文化
- 10、语音与文化
- 11、语言交际与文化
- 12、语言与民俗
- 1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 14、人物